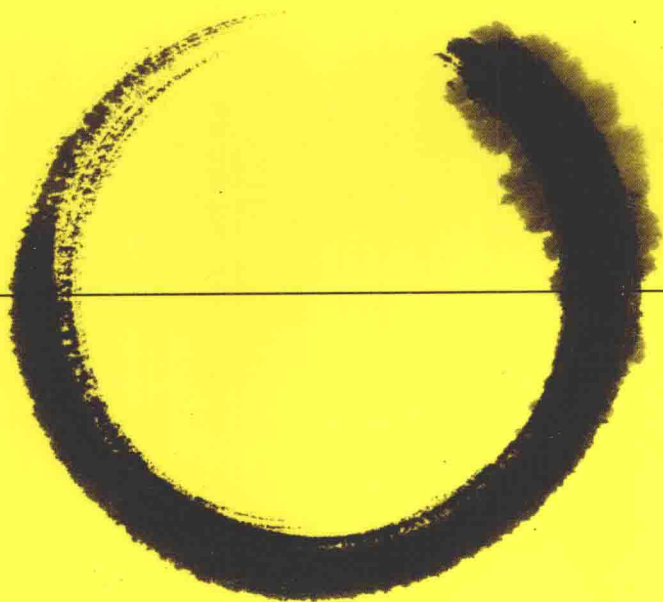


# 民国文化与民国文论

黄健 著

主编 李怡 张中良

『民国历史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



山東  
藝  
出版社

# 民国文化与民国文论

健 著

主編 李怡 張中良

『民国历史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重点项目『民国社会历史  
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框架』阶段性成果

山東文藝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国文化与民国文论/黄健著.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15.6

(民国历史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李怡,张中良主编)

ISBN 978-7-5329-4906-9

I. ①民… II. ①黄… III. ①文化史—中国—民国 ②中国文学—现代文学史—民国 IV. ①K258.03 ②I2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17594 号

民国历史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

## 民国文化与民国文论

黄 健 著

---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  
邮 编 250002  
网 址 [www.sdwy.com](http://www.sdwy.com)

---

读者服务 0531-82098776(总编室)  
0531-82098775(市场营销部)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mailto:sdwy@sdpress.com.cn)

---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开 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1 插页/2  
字 数 280 千  
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29-4906-9  
定 价 38.00 元

---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图书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 总序之一

# 民国历史文化与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可能

李怡

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是“民国”，从民国历史文化的角度考察中国现代文学，既是这一历史阶段文化自身的要求，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新的动向。

中国现代史上的“中华民国”是现代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环节，无论是作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历史标志，还是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在内的全体中国人都曾为“民国”的民主自由理想而奋斗牺牲的重要事实，“民国”之于现代中国的意义都是值得我们加以深究的。与此同时，中国现代文学的“叙史”也一直都在不断修正自己的框架结构，从一开始的“新文学”、“现代文学”到1980年代中期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每一种命名的背后都有显而易见的历史合理性，但同时又都不可避免地产生难以完全解决的问题。“新文学”在特定的历史年代拉开了与传统文学样式的距离，但“新”的命名毕竟如此感性，终究缺乏更理性的论证；“现代文学”确立了

“现代”的价值指向，问题是“现代”已经成了多种文化争相解释、共同分享的概念，中国之“现代”究竟为何物，实在不容易说清楚；“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确立的是百年来中国文学的自主性，但是这样以“世纪”纪年为基础的时间概念能否清晰呈现这一文学自主的含义呢？人们依然不无疑问。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上，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叙史”的“民国”定位被提了出来，形成了越来越多的“民国文学史”命名的呼吁。

“民国文学”的设想最早是从事现代史料工作的陈福康教授在1997年提出来的<sup>①</sup>，但是似乎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2003年，张福贵先生再次提出以“民国文学”取代“现代文学”的设想，希望文学史叙述能够“从意义概念返回到时间概念”，<sup>②</sup>不过响应者依然寥寥。沉寂数年之后，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即将结束的时候，终于有更多的学者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特别是最近两三年，主动进入这一领域的学者大量增加。国内期刊包括《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争鸣》、《海南师范大学学报》、《郑州大学学报》、《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都先后发表了大量论文，《文艺争鸣》与《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等还定期推出了专栏讨论。张中良先生进一步提出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民国史视角”问题，我本人也在倡导“文学的民国机制”研究。在我看来，“民国文学”研究的兴起十分正常，它们都显示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探索之后一次重要的学术自觉和学术深化，并且与在此之前的几次发展不同，这一次的理论开拓和质疑并不是外来学术思潮冲击和感应的结果，从总体上看属于中国学术在自我反思中的一种成熟。

当前学界的民国文学论述正沿着三个方向展开：一是试图重新确立学科

---

① 陈福康：《应该“退休”的学科名称》，原载1997年11月20日《文学报》，后收入《民国文坛探隐》，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

② 张福贵：《从意义概念返回到时间概念——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命名问题》，香港《文学世纪》2003年4期。

的名称，进而完成一部全新的现代文学史；二是为旧体文学、通俗文学等“新文学”之外的文学现象回归统一的文学史框架寻找新的命名；三是努力返回到历史的现场，对民国社会历史中影响文学的因素展开详尽的梳理和分析，结合民国文学历史的一些基本环节对当时的文学现象进行新的阐述和研究。在我看来，前两个方向的问题还需要一定时间的学术积累，并非当即可以完成的工作，否则，仓促上阵的文学史写作，很可能就是各种旧说的汇集或者简单拼贴，而第三个方面的工作恰恰是文学史认识的最坚实的基础，需要我们付出扎实的努力。

从民国历史文化的角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可以为我们拓展一系列新的学术空间。

例如民国经济形态所造就的文学机制，民国法制形态影响下的文学发展，民国教育制度的存在为文学新生力量的成长创造怎样的文化条件、为广大知识分子的生存提供怎样的物质与精神的基础等等。还有，仔细梳理中国现代作家的“民国体验”，就能够更加有效地进入他们固有的精神世界与情感世界，为我们的中国现代文学提出更实事求是的解释。

当然，讨论中国现代文学的“民国”意义，挖掘其中的创造“机制”绝不是为了美化那一段历史。在现代中国文化建设的漫长里程中，在我们的现代文化建设目标远远没有完成的时候，没有任何一段历史值得我们如此“理想化处理”，严肃的学术研究绝不能混同于大众流行的“民国热”。今天我们对历史的梳理和总结是为了呈现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些可资借鉴的机制，以为未来中国文学的生长探寻可能——在过去相当长的历史中，我们习惯于在外国文学发展的历史中寻找我们模仿的对象，通过介绍和引入西方文学的各种模式展开自己。殊不知，其中的文化与民族的间隔也可能造成我们难以逾越的障碍。如今，重新返回我们自己的历史，在现代中国人自己有过的历史经验和智慧成果中反思和批判，也许就不失为一条新路。

呈现在读者诸君面前的这一套“民国历史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丛书，试图从不同的方向挖掘“以历史透视文学”的可能。这里既有新的方法论的倡导——诸如“民国”作为“方法”或者作为“空间”的含义，也有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学新论，有“民国”下能够容纳的特殊的文学现象梳理——如民国时期的佛教文学，也有民国文学品种的崭新阐述。它们都能够带给我们对于历史和文学的一系列新的感受，虽然尚不能说架构起了民国历史文化现象的完整的知识结构，却可以说是开辟了文学研究的新的可能。但愿我们业已成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能够因此而思想激荡、生机勃勃。

（作者为天津出版传媒集团副总编辑）

2014年6月，北京

# 历史还原是现代文学 学科拓展的有效途径

张中良

中国现代文学就其学科性质而言，属于历史与文学的交叉学科，历史品格是其立身之本。现代文学是在怎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发生与发展起来的，对传统有何承续，对当代有何影响，自身呈现出怎样的脉络等等，都需要以历史的眼光来观照。从这门学科正式确立的1950年代之初开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观占据支配地位长达数十年之久。1980年代以来，尽管现代文学史叙述中越来越少使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概念，但实际上这一历史观仍然在起着柱石的作用。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观的确为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现代文学被阐释为无产阶级所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学，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同步发展，于是，理所当然地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正义性与新政权合法性的有力见证。也正因为如此，研究对象只有三十几年历史的这门新兴学科，地位迅速上升，许多高校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与涵盖三千余年历史的古代文学教研室地位相当，后来又吸纳了当代文学，现当代文学



与古代文学同样属于一级学科中国文学下面的二级学科，学科队伍快速壮大。学位制度建立之后，现当代文学硕士点、博士点星罗棋布。据初步统计，从1984年到2014年，已经通过答辩的现代文学（含跨现当代文学）博士论文达2000篇之多<sup>①</sup>。

在新民主主义文学的阐释框架内，文学的政治功能与社会作用得到重视，从1920年代的革命文学到1930年代的左翼文学，再到抗战时期的工农兵文艺获得高度肯定；五四启蒙文学、1930年代的民主主义文学及自由主义文学、九一八之后逐渐发展到卢沟桥事变之后形成高潮的抗日救亡文学，也得到程度不同的肯定。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的重要脉络，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观来审视现代文学的确有其合理之处，并且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历史是复杂的，20世纪上半叶，中国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期，单纯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视角审视现代文学，就会有意识地遮蔽甚至扭曲部分历史事实。譬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视角下，自由主义文学的价值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对于现代文学的审美结构与风格特色及它对传统的继承与突破也显得关注不够。改革开放以来，在现代性视角与20世纪中国文学整体观的观照下，这些缺陷才得到一定程度的弥补。

然而，仅仅增加现代性视角与20世纪中国文学整体观视角，还不能实现全面的历史还原。1912年成立的中华民国不仅为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提供了历史背景，而且民国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已经内化为文学的内蕴与风格。在民国视角缺失的情况下，民族主义文学脉络不仅得不到足够关注，甚而被给予有悖于历史主义的负面评价。抗战文学叙事残缺不全，一般

<sup>①</sup> 据洪亮辑录《1984—2012年中国现代文学博士论文题名一览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7期），1984—2012年通过答辩的博士论文1763篇；中国大陆现代文学博士点（含一级学科）40个左右，按每个博士点每年毕业3人计算，2013—2014年约240篇博士论文通过答辩，累计总数约2000篇。

的叙述模式只说1938年10月27日武汉三镇失陷之前，全国文艺界掀起抗日救亡高潮，接下来便分区域叙述，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与其他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文学，一派新天地、新人物、新风格；国统区文学揭露当局腐败，抨击日本暴行，表现民生苦难；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的上海租界与香港，成为隐晦表达抗日意旨的特殊场域；沦陷区文学到1980年代中期才受到关注；至于表现正面战场的文学，则很少提及，而且评价偏低。这样一种抗战文学叙事，怎么能够与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主战场之一的中国抗日战场的地位相匹配呢！即使是左翼文学，由于忽略了特定的历史背景，对其复杂性与其在民国文化生态中的位置也未能做出全面而准确的阐释。

那么，为什么民国背景会被长期忽略呢？主要原因在于政治眼光代替了历史眼光，人们往往把民国仅仅理解为政府，而民国政府因为腐败不堪才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所推翻。这样一来，民国就成为一个否定对象，谈现代文学与民国的关系，主要是谈当局对现代文学的限制压迫与现代文学对当局的揭露批判。然而，实际上，民国绝不能简化为政府，民国是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由先驱者抛头颅洒鲜血才终于建成，民国不管有多少新生的稚嫩、成长的扭曲，但毕竟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应该引为中国的骄傲；民国是一个国家实体，曾经为数万万中华儿女命运之所系，为世界120多个国家所承认；民国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自然有政府，也有法律、教育、文化、文学、艺术，更有民国的经济（工业、农业、金融、商业等）、军事、外交。我们通常所说的民国，不少场合指称的是1912年1月1日至1949年9月30日这一历史时期。在将近三十八年中，中国承受了多少内忧外患，经历了怎样的艰难曲折，但毕竟实现了南北统一，收回了部分被列强攫取的权益，尤其是打败了日本侵略者，确立了在国际上的重要地位；无论存在着多少社会弊端，有着怎样的致命缺陷，但民国毕竟是民国，袁世凯的皇帝梦被枪声所惊醒，一代枭雄在惊恐不安中一命呜呼；张勋复辟，旋即破产，徒然留下一个笑柄；法律并非尽是一纸空文，身为教育部佥事的周树人

据理力争，赢得了对教育总长的官司；经济、教育、文化、新闻出版等均有长足发展，若非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打乱了正常秩序，中国现代化进程会取得可观的成就。

即以政府来说，也不是铁板一块，不能一概而论。1912年1月至3月为南京临时政府，时间虽短，但已呈现出万象更新的气象。1912年3月至1928年6月为北洋政府，尽管由于北洋军阀内部矛盾重重，执掌权柄者如走马灯一样变换，其间又上演过复辟的丑剧，而且百般防范、顽固抵御南方革命势力北进，但在此期间，北洋政府是国家主权的代表，事实上控制着中国大部分国土，在经济、外交、教育、文化等方面并非一无是处，否则，怎么可能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民族经济的大发展，怎么可能有巴黎和会上中国权益的最终维护，怎么可能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怎么可能有新文学社团如雨后春笋，新文学势如破竹，站稳脚跟，走进课堂，在文学殿堂升帐挂帅？在北洋政府尚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而北伐战争的最终胜利可以预期的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告成立。尽管南京国民政府染上了“四一二政变”的血腥，但它毕竟是北伐战争的重大成果，而且到翌年6月终于结束了北洋政府的统治，并于1928年12月完成了政权的统一。1930年代中国经济、外交、文化、教育、科学、文学、艺术的发展，不能说国民政府一点积极作用没有，否则，文学园地的拓展，文学创作与翻译的丰收，《家》、《骆驼祥子》、《边城》、《故事新编》、《死水微澜》、《新月诗选》、《望舒草》、《烙印》、《大堰河》、《义勇军进行曲》、《宝马》、《且介亭杂文》、《缘缘堂随笔》、《泪与笑》、《塞上行》、《画梦录》、《雷雨》、《日出》、《上海屋檐下》等经典的问世，就无法解释。即使在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方针之时，国民政府也在一定程度上悄悄地进行抗战准备（如聘请德国教官训练部队，进口新式武器装备，修筑吴福线、锡澄线等高等级国防工事，成立专门机构进行抗战对策研究等）。抗战全面爆发之后，抗战建国的国策获得全民的共识，终于赢得了抗战胜利。国民政府的结构性缺陷到抗

战胜利后充分显露，一方面挑起内战，另一方面歪风当道，五子登科，贪腐公行，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终于在大陆彻底坍塌，不得不让位于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一个政权最后垮台，只能说明它背弃了人民，最终为人民所唾弃，但这并不等于这个政权一开始就黑暗至极，否则，古今中外那么多王朝、国家先盛后衰又如何解释呢？

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说：“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这种“实录”，亦即实事求是，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我们在现代文学史研究与叙述中应予发扬光大。把中国现代文学还原到民国历史文化背景下去认识与叙述，不是为一个已经逝去的历史时期唱挽歌，更不是为一个已被历史证明最后失去生命力的政权唱赞歌，而是要还原民国历史文化的原生相，黑即黑，白即白，何时何处姹紫嫣红，何时何处污泥浊水。生态环境明了了，在这一环境中发生发展的现代文学生态系统才能清晰地梳理出来，丰富多彩的样貌与错综复杂的矛盾才能真实地呈现出来。这样的研究与叙述才能既无愧于历史本身与优秀传统，也无愧于今人与后人。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民国历史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正是司马迁“实录”精神的发扬光大，有助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因此，我很乐于认同与支持。

2014年8月7日于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南洋公寓

# 目录

总序之一	民国历史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可能	1
总序之二	历史还原是现代文学学科拓展的有效途径	5
绪论	民国文化视域中的文论建构与发展	1
第一章	历史进化文化与民国文论观念变革	16
第一节	明清文艺变革思潮对民国文论观念的影响	17
第二节	引进西方文论对民国文论观念的启示	27
第三节	民国新文化运动兴起对民国文论观念的构建	38
第二章	文化转型发展与民国文论意义诉求	50
第一节	“破”与“立”：民国文论新思维	51

第二节	“民主”“科学”文化与民国文论新导向	61
第三节	“人的文学”与民国文论的理论自觉	68
第三章	审美文化嬗变与民国文论价值建构	79
第一节	由“中和”向“崇高”的价值转换	81
第二节	“崇高”审美意识与民国文论的价值追求	91
第三节	“崇高”美学范式与民国文论的价值形态	100
第四章	文化开放格局与民国文论思潮流变	112
第一节	文化交汇与文学思潮的兴起和发展	114
第二节	文化融合与三大文学思潮的交错	123
第三节	文化多元与民国文学流派和论争	140
第五章	艺术革新文化与民国文论话语系统	178
第一节	艺术革新逻辑与民国文论话语基点	180
第二节	艺术革新范畴与民国文论话语聚焦	193
第三节	艺术革新宗旨与民国文论话语策略	213
第六章	知识谱系转换与民国文论发展路径	246
第一节	文化多样性与民国文论发展理路	247
第二节	新知识传播与民国文论发展动力	262
第三节	民国文论的创新性发展品格	271
结语	民国文论现代性价值的文化追求	286

附录一	“民国文学”还是“现代文学”？	
	——关于民国文学发展的思考	..... 293
附录二	战争与人生苦难的审视	
	——从人学视域看民国作家的战争书写	..... 304
后记		..... 318

# 绪论 民国文化视域中的文论建构与发展

民国文化的生成与发展，推动了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型。作为中国的新文化，民国文化既是晚清以来中国历史、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也是现代中国经历长期的物质、精神变革的必然结果。民国文论是在民国文化的语境中获得建构与发展的。从具体的源流上来说，民国文论的建构与发展，分别受到现代西方文化、文学理论思潮，及明清以来中国文学变革思潮的双重影响，在整个建设理念和体系构建上，确立了以“人的文学”为理论基点和价值原则的“大文论”格局。从民国文化维度审视民国文论的生成与发展，特别是通过对民国文论的范式、话语、路径、策略、规则等方面的探讨，人们不难发现，进入民国时期，随着现代出版传播业的迅速发展，新文化、新思想、新观念得以广泛传播，一种新的文学形态和文论形态也随之诞生。民国文论受新文化、新文学观念的影响，一改历代文论那种重感悟、重点评的传统，转向注重新文学的理论建构，注重文论的逻辑体系建构，形成一种富有现代性价值内涵的“大文论”格局。



民国文论通过整体的现代转型，建立起了一种以现代性价值为内涵的理论构架。在中国文学和文论发展历程中，民国文论开辟了中国文论发展的新纪元，具有“划时代”和里程碑的历史地位与文化价值，对后世文论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一 民国文化变革与民国文论观念演化

民国时期“大文论”格局的形成，有着深厚的历史传承和时代发展的双重因素。从历史传承上来说，明中叶以来的文艺变革思潮及对文学理论的影响，也一直延续到晚清和民国。周作人指出，新文学理论的兴起及其创作实践不外乎“两重的因缘，一是外援，一是内应。外援即是西洋的科学哲学与文学上的新思想之影响，内应即是历史的言志派文艺运动之复兴。假如没有历史的基础，这成功不会这样容易。”<sup>①</sup>从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上来看，明中叶以来的文艺变革思潮为民国文论建设起到了强有力的支持作用。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在论述明清文艺变革思潮对新文学的影响时指出：“从明中期开始，要求解放个性、积极表现自我的创造精神的文学思潮重新抬头，至晚明达到高峰，并获得丰富的成果。明末至清代前期，它再次受到封建正统文化的反拨和抑制。但这一次却没有达到明代前期的那种效果，晚明文学的种种特点在低潮状态中得到顽强的延续。这表明中国文学中的变异因素已经广泛而深入地浸染人心，不可能加以彻底清除。如此延伸到清代中期，发展成一个新的文学高峰。……与此同时，清末民初的中国知识阶层因为种种矛盾的困扰，开始更为积极地关注和更为深入地了解西方文化，元明以来在封建专制压迫下争取个性解放的历史潮流，为西方具有相似内涵而在理论上更为完整和强烈的学说所激扬，遂由此催发了从文学革命

<sup>①</sup>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第6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10页。